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創設為核心的考察

Transform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of Lieu de Mémoire: A Study on the creation of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in France

doi:10.6752/JCS.201309\_(17).0002

文化研究, (17), 2013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7), 2013

作者/Author：陳瑞樺(Jui-Hua Chen)

頁數/Page：7-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309\\_\(17\).000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309_(17).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Transform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of *Lieu de Mémoire*: A Study on the creation of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in France

Jui-Hua Chen

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  
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創設為核心的考察

陳瑞樺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移民的再現政治——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CNHI)為核心的考察」(NSC101-2410-H-007-036-MY2)的部分成果。在此之前，筆者於就讀博士班階段曾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進行「1930黑色巴黎：黑人文化浮現與殖民文化關係」(96-1文學類調查與研究項目)，該研究的部分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於此併致謝忱。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2009年年會」，感謝評論人李威震教授的評論和與會者的提問。最後，筆者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的寶貴建議與批評。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chenjh@mx.nthu.edu.tw

## 摘要

本文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CNHI)的設立為基點，回溯其館舍金門宮(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從1931年建造以來所經歷的定位轉變，並將此一過程與21世紀初法國民族學博物館群的重整聯繫起來考察，以探究位於世界體系中的前殖民國，如何在全球化的脈絡中治理移民課題並重新界定國族認同。博物館是社群關係經過層層轉化之後凝聚而成的表徵；時空換喻：「在界定我群與他者關係時，將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之間進行代換以定義我群與他者關係的理解方式」，則是用來詮釋社群關係轉變的概念。

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使命在肯認移民並轉換社會大眾看待移民的視角。轉換看待移民的視角，同時也是轉換觀看法國的視野，重新理解法蘭西國族的構成基礎。從而移民博物館所要述說的不只是做為社會史一環的移民史，並且是由移民史為敘事軸線的法國史。

借鑒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案例，本文區分了「族群博物館」和「移民博物館」的不同。族群博物館是以特定族群的延續與發展為敘事軸，而移民博物館則是以土地為敘事軸，以國家為主要敘事架構，個別族群則在移民敘事下被相對化。然而「移民博物館」的思考基點並非做為民族國家整體表現的國土，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進到這方土地的人。

對移民博物館的討論，其核心正在於認識「移民社會」是什麼。移民博物館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自我/他者關係，自我前往遠外成為他者，原本遠外的人變成我群的社會成員。移民，既是自我變成他者，也是他者逐漸變成我群的過程。

關鍵詞：移民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移民再現、記憶之所、時空換喻

##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study how France, a former colonial empire, tries to redefine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o govern the immigration issu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rearrangement of existed ethnographic museum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museum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CNHI). Immigration museum and ethnographic museum are analyzed as two kinds of representations of such relationships. The concept created to interpr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ch relationships is “the metonym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which means a way of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through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mission of CNHI is to recognize immigrants and to change people's perspective towards them. Changing the perspective towards immigrants results in changing the vision about France. What is intended to be told in the immigration museum is not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as a part of social history, but the history of France based on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CNHI, I differentiate “the ethnic museum” from “the immigration museum”. The narration of the ethnic museum is based on the continu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ethnic group. In contrast, the narr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museum bases on the land and the nation is used as the main frame for such narration, so as to relativize each ethnic group in the narration of immigrant nation. Nevertheless, the core concern of the immigration museum is not about the territory of the nation state, but peoples who have come to live in this lan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e key implication of discussing the immigration museum resides in understanding “what is the immigrant society”. The migration museum incarnates the self/other relationship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elf” goes abroad and becomes the other, while people from far land become members of our society. Migra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self” becomes the other, and the other gradually becomes part of us.

**Keywords:** immigration museum, ethnographic museum,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tion, lieux de mémoire, metonym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圖1：金門宮。欄杆上懸掛的橫幅廣告，左前為CNHI館方策劃的首檔特展「1931年：殖民博覽會時期的外國人」，右後為常設展「座標」。（陳瑞樺攝）

## 一、前言

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CNHI)於2007年10月10日於巴黎市東緣的金門宮(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開幕，館舍建築原本是為舉辦1931年殖民國際博覽會而建造的接待處，內外充滿著殖民風味的雕刻和壁畫。殖民博覽會結束後，金門宮設立為「殖民博物館」，之後定位歷經多次轉換。隨著國立移民歷史城的籌備及開幕，「殖民」和「移民」這兩段指涉不同運動方向的歷史，透過金門宮這座建築被連結在一起。國立移民歷史城的設立不只成為殖民到後殖民文化關係轉變的見證，也反映了法國在全球化潮流下進行社群關係重構的趨向。

本研究將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設立為基點，回溯其館舍金門宮從1931年設立以來所經歷的定位轉變，並將此一轉變放在21世紀初法國民族學博物館群的重組現象中考察，以探究位於世界體系中的前殖民國，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脈絡中，重新界定國族認同與治理移民課題。

以下內容共分五節：第二節「以移民博物館做為考察當代社群關係變動的表徵」，說明本研究的思考脈絡；第三節「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從金門宮的興建緣由及其定位在歷史中的轉變過程，說明法國的移民博物館與民族學博物館的歷史關連；第四節「一座移民博物館的誕生」，將依序說明移民博物館的倡議與籌備，金門宮空間性質的轉化，國立移民歷史城的定位及使命；第五節「思索『移民博物館』」，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做為參照，探討移民博物館的敘事原則；最後第六節結論，從法國民族學博物館群的重組與國立移民歷史城的設立，來探討我群／他者關係在當代如何轉變。

## 二、以移民博物館做為考察當代社群關係變動的表徵

探討移民博物館，目的在探究全球化時代的社群關係變動。因此在說明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設立過程及其所在館舍金門宮的定位流變之前，我們要先闡述對我群與他者關係的界定如何與時間和空間的體驗發生關連。筆者將此一關連稱為「時空換喻」(metonymy between time and space)，也就是在界定我群與他者關係時，將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進行代換以定義我群與他者關係的理解方式。以下我們將先借助既有研究來說明時空換喻的意義，接著再說明何以移民博物館可以做為探討此一關係的表徵。

### (一) 現代過程中的時空換喻

人類學家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認為，在原始分類中，群體是以同心圓的觀點來理解我群和外在世界的關係，自身所處的空間為中心，遠外的空間被認為是神秘及超自然的空間。隨著空間距離的

拉長，非在地性的增加，他群愈被賦予非人性的特徵。在這種認識圖式中，對於社群外部世界的認知是空間性更勝於時間性－歷史性的 (Friedman 1994: 44-45)。

隨著現代過程的展開，這種以空間性為主的族群觀產生轉變。演化論的認識觀點將不同文明之間所形成的中心／週邊／邊緣的結構，看成是文明人與文明發展程度較低的古人之間的演化關係，居於演化論核心的是階序制的社群觀。基於此種觀點，全球不同地區被排列在朝向歐洲工業文明演進的尺標上。空間被誤譯為時間，從而讓空間時間化(ibid.: 5)。'隨著文明模式的浮現所發生的意識形態空間的本質性轉型，就在於神秘的／超自然的樣貌被實際上的邊陲／邊陲化／邊緣化的人群所代替，並且由同心圓模型被轉譯為等級性的或線性的時間模型(ibid.: 46)。

上述在現代過程中所形成的將時間與空間相互代換的理解，我們稱之為「時空換喻」。時間和空間會發生代換關係的前提，是地理空間的障礙逐漸被跨越，但仍然以程度不一的狀態存在。地理空間被跨越，由此原本遠外的人群才會進入參照視野；空間障礙仍然存在，才會在心理上產生時間歷程的感受。無論如何，上述說明所呈現的是少數人群經由跨國跨洋的移動，進入有著不同文化的異邦，是「自我」進入了「他者」的世界。然而一旦將「他者」帶到「自我」的世界來展示，又會產生什麼樣的社群關係呢？

---

1 受到演化論的影響，即便是對遠外的文化實踐抱持正面評價的學者，亦不能免於將時間空間化的認識論。例如莫斯(Marcel Mauss)發表於1923-1924年的名著《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和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其寫作架構就充分反映了這種跨越空間等於回溯人類歷史時間的想法。從波里尼西亞、安達曼群島、美拉尼西亞、西北美，到上古羅馬、古典印度、日耳曼，最後在結論中提到距離寫作時間五十年前的法國，莫斯所意圖建構的圖式是從原始社會到20世紀初法國的變化狀況。然而被建構成較為原始交換形式的庫拉圈及誇富宴，卻是與莫斯同時代的現象，而被莫斯建構為晚近人類狀況的日耳曼乃至法國，反而是在相對遙遠的過去所發生的事。從而，莫斯所呈現的世界圖像就雜揉了演化論和尚古論於一體。

## (二) 全球化時代中社群關係的重新界定

以時空換喻的概念為基礎，我們要進一步追問，一旦跨越空間所需的時間越來越短，時間與空間的分立代換關係是否會產生性質上的改變呢？

1989年哈維(David Harvey)出版《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這本書時，他所針對的論題是「後現代」，然而這本書卻成了1990年代全球化討論的前導。哈維所要解析的是在後現代主義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彈性的資本積累模式、資本主義再結構過程中新一輪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而在此我們所關注的則是時空壓縮此一過程所聯繫的社群政治課題。將哈維的論題與弗里德曼相結合，我們可以進一步問：在全球化時代，隨著「時空壓縮」的程度不斷提高，原本分布在不同地理區位的人群進行更遠距、更快速、更頻繁的移動。伴隨著時空體驗的轉變，在現代時期所建立的社群意識，以及對於我群與他者的認知，是否也相應地發生了某種變化呢？

「現代」，與其將它視為一種狀態，不如將它看成是多種過程。在這些過程中，時間及空間的意識被重新塑造，原本居住在不同地理空間中的人群彼此會遇。由此，現代過程同時包含了時間意識、空間意識及社群意識三者的轉變。這三種意識的轉變並非各自發生，而是彼此嵌合並相互生成為一種意識叢結。換言之，對於時間和空間的經驗，與對「他者」的界定方式相聯繫；隨著時空體驗轉變，我們對他者的關係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動。

如果上述假設為真，那麼，當世界歷史從殖民帝國與民族國家擅場的時代，演變到今日全球化動力不斷推展的時代，空間、時間與社群之間的關係又會開展出什麼樣的面貌呢？

## (三) 以移民博物館做為考察當代社群關係變動的表徵

要探究全球化時代中社群關係的轉變，應該要考察何種社會現象呢？對於不可見的社會關係，必須要選擇可見的社會現象做為表徵。在種種表徵之中，民族學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可能是最

具有代表性與說明性的機構，因為它們不只是機構表徵(institution as representation)，並且它們本身就是界定社群關係的表徵機構(institution of representation)。做為文化展示機構，民族學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將其所處時空脈絡下對於族群知識的建構及社群關係的認知提煉為一套展示架構及內容，由此撐開了認知我群與他者關係的天蓬，其本身的存在及定位就是一種社群關係的表徵。做為表徵社群關係的機構，民族學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透過對於人群文化或歷史的界定及展示，試圖傳遞一套社群認知圖式，進而生產及再生產不同歷史群體之間的社會關係。

無論如何，民族學博物館與移民博物館是兩種不同的機構，它們誕生於不同的脈絡，有著不同的展示邏輯。但如果這是兩種不同的機構，在我們的研究中卻被放在一起討論，那麼在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內在聯繫呢？民族學博物館的設立、帝國殖民歷史以及民族學的發展，三者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隨著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帝國已經瓦解，但原來的帝國屬民(subject)在試圖向外尋求更好的生活可能性時，前殖民母國仍然是最常浮現的目的地。由此，殖民地與前殖民母國的關係，轉變為移出國與移入國的關係，屬民變成了移民。隨著移民第二代的誕生成長，移民問題的性質愈益從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外部問題」，變成國族(nation)的「內部問題」。屬民、移民、公民三者的關係，也由於移入國與移出國的歷史淵源而形成某種充滿緊張的連續性。

如前所述，做為國家或公共組織所設立的文化機構，民族學博物館及移民博物館在界定及展示不同歷史群體的同時，不只在傳遞一套新的認識，也在建構新的社會關係。由此，民族學博物館與移民博物館不僅是文化展示機構，同時也是文化治理機構。如果民族學博物館與移民博物館在歷史過程及社群關係這兩個向度上有其連續關係，那麼當國家在全球化時代重新界定社群關係時，就不可能只設立移民博物館，而不進行民族學博物館的重整。當然，在實際社會過程中，這兩者不見得會成為意圖鮮明的配套計畫，兩種機構並不必然會同時變化，而可能表現為有著相當時差的遞變；即便是共變，也不見得是在



不同行動者之間協商出來的整體計畫，而可能是在時勢中彼此推移的非意圖性結果。然而在此我們所要強調的是，由於同樣面對世界局勢的轉變，共同處於時空壓縮及社群關係重構的時代，即便這兩類博物館在行政計畫上並無配套關係，卻都必須在新的歷史局勢中進行認識及定位的調整。由此，移民博物館的設立必然會連動產生既有民族學博物館的重整。正因如此，對移民博物館的考察不能不同時注意民族學博物館的轉型，所區別者是在研究敘事中以何者為主，以何者為副。

對於我們的研究關懷而言，移民博物館的建立是研究主軸，民族學博物館的重整是研究的副軸。我們選擇用來考察當代社群關係變貌的表徵是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CNHI)，也就是法國的移民博物館。這座移民博物館所使用的館舍金門宮，其前身正是從殖民時代一路流變而來的民族學博物館。



圖2：金門宮正門及立面浮雕。(陳瑞祥攝)

### 三、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

移民博物館與民族學博物館的共變，雖然就歷史過程而言有其內在聯繫，但兩者設立的時空卻往往是分立的。民族學博物館的創設遠遠早於移民博物館，並且經常與殖民歷史聯繫在一起；移民博物館則要到1980年代之後才出現，並且移民博物館的館址往往選在與移民歷史有密切關連的場所。然而在法國，由於國立移民歷史城選擇金門宮做為館址，從而民族學博物館的轉型和移民博物館的設立不只在社群關係演變的歷史過程有所關連，同時在空間歷程上也形成了連續關係。殖民記憶與移民記憶，就這樣疊加在金門宮這方空間之上。本節首先要帶入「記憶之所」(les lieux de mémoire)<sup>2</sup>這個概念，除了說明概念的涵義，更重要的是在呈現這個概念與移民相關的智識脈絡；接著說明金門宮被建造的殖民歷史脈絡，並簡單勾勒殖民時代的我群／他

---

2 Les lieux de mémoire的兩種英文譯本分別將書名譯為*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以及*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日文選譯版則將本書譯名定為「記憶の場—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社会史」(岩波書店，2002)。中文選譯版的譯者戴麗娟女士認為，許多外文版本用記憶之場、記憶之域、記憶之處來翻譯les lieux de mémoire，是因為lieux這個詞容易讓人使用與空間、場域有關的詞彙。然而lieux de mémoire不只是用來指紀念館、紀念碑等各種形式的建築物及物理空間，同時也指涉了象徵符號和抽象概念。「而且重點不是在研究這些記憶之處的客觀存在，而是每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因為當時的需求來為這些事物注入新的意義……透過它，後人可觀察到的是國族經歷過的一個又一個歷史時期的思想與情感的糾結」(戴麗娟2012: 12-13)。基於上述理解，戴麗娟將les lieux de mémoire譯為「記憶所繫之處」，而不採取較易記誦的「記憶之處」，「為的就是避免此書被誤以為是用來強調紀念碑、紀念日、紀念物的重要性，而這些正是這份研究著作當初企圖除魅的對象」(ibid.: 13)。上述說明涉及到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方面是les lieux de mémoire的非物理空間層面，另一方面是les lieux de mémoire的社會建構層面。「記憶所繫之處」的譯法採用「之處」維持了lieux這個詞所具有的空間指涉，但加上「所繫」，用「繫」這個字強調了社會行動面向。本文將les lieux de mémoire譯為「記憶之所」。「所」這個字既能做為名詞用來指所在的物理空間(場所、所在)，也可做為代詞用來指事物(所是、所繫、所構)。以「記憶之所」做為譯詞，維持了與原文的對應性，並且保留了這個詞彙的多義性。它能夠同時表達物理空間的場所與非物理空間的事物，以及連繫其上的建構與被建構的雙重過程。

者關係；然後說明金門宮館舍在後續歷史過程中的定位轉變，也就是記憶在這方空間疊加、覆蓋的過程，進而帶出晚近法國民族學博物館群重整所反映的社群意識變動。

### （一）記憶之所

法國歷史學家諾哈(Pierre Nora)有感於往昔清楚銘刻的國史記憶逐漸模糊，於1978-1981年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的研討課陸續邀請了多位歷史學家，各自從不同面向探討對於國族記憶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社會事實。這項計畫起初設定的目標是要揭示存在於有形紀念建築如烈士紀念碑或先賢祠，與第二層次多種多樣的對象如博物館、紀念會、檔案、信條、標誌，乃至距離更遠的第三層次對象，包括機構（如法蘭西學院）、事實（如邊界），以及行政類別（如省）、政治類別（如左與右）、時間類別（如世代）等等現象之間的關係。原本的動機只是要說明那些承載了國族記憶的場所，然而經過三年的研討，這個計畫最後發展成對於國族表徵及國族神話的詳細分析，成為一部以「記憶」為主題的法國史(Nora 1997: 7)。

諾哈指出：「記憶之所」以其顯明的存在，體現了存在於記憶、國族以及這兩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Nora ed. 1984: VII)。記憶(mémoire)預設了回憶(souvenir)，但並不同於回憶：記憶並不對反於遺忘，而是包含了遺忘。記憶與其說是一種內容，不如說是一個框架，它是一種可資運用的籌碼，是一整套策略。要理解記憶之所，與其關注它是什麼，不如觀察人們如何操作。由此我們碰觸到記憶之所的文學面向，歸根究底，其旨趣在於搬上舞台的藝術及歷史學家個人的投注(ibid.: VIII)。由此來看，「記憶之所」負載的與其說是歷史的內容，不如說是國史的記憶如何被定義和形塑的過程。記憶，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地被改寫。<sup>3</sup>記憶之所的重新定義，不只是為了改寫關於國史的記憶，也是為了重塑社群關係。

---

3 雖然國家是記憶改寫的主要行動者，並且往往是發起者，但記憶的改寫並不只是國家單方面的操作，而是不同社會部門及各部門內不同行動者彼此競合的結果。

法國自1970年代末葉開始經歷的國史記憶變動，與全球範圍的去殖民過程及國內移民課題的浮現息息相關。做為舊殖民宗主國，法國的移民課題與殖民歷史緊密相連。直到二戰前，殖民仍然是受到國家大肆宣揚的偉業。正如歷史學家阿哲宏(Charles-Robert Ageron)所言：

有哪個往昔的小學生會不記得自己曾經在公立小學的課本上學到：「第三共和的榮光在於將法國打造成一個帝國，讓她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殖民強權。」「殖民，是共和國的完滿傑作。」(1984: 561)

然而殖民記憶在二戰後便從國史敘事中淡出，殖民不再被認為是一段光彩的歷史。另一方面，第一部以移民為主題的歷史直到1988年才出版，‘在此之前，沒有一本著作是從移民的角度來看待法蘭西國族的構成。

到了21世紀初期，移民已成為法國學術圈發展成熟的顯學，殖民課題也在法國社會重新檢討販奴及殖民歷史責任的大背景中被廣泛討論。就在這一場場「記憶之戰」<sup>4</sup>的社會氛圍中，為了舉辦1931年國際殖民博覽會而建造的金門宮被選為「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館舍，殖民記憶與移民記憶就從浮動不定的論域轉而在這方「記憶之所」交會。國立移民歷史城的所在——金門宮的演變軌跡，成為體現殖民／移民關係的空間文本。為了理解糾纏於文本中的民族／殖民／移民三者錯綜複雜的關係，讓我們先回溯這方記憶之所的誕生與流變。

## (二) 1931年國際殖民博覽會<sup>6</sup>

1931年5月6日，國際殖民暨海外地區博覽會(l'Exposition Coloniale

---

4 指歷史學家諾瓦里耶爾(Gérard Noiriel)的《法國熔爐：19~20世紀移民史》(*Le Creuset français.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XIXe-XXe siècles*)一書。見後文說明。

5 「記憶之戰」(*la guerre des mémoires*)是法國歷史學家史托哈(Benjamin Stora)接受採訪整理而成的著作書名。參見Stora(2007)。

6 本節關於1931年國際殖民博覽會的基本資料，引自：Catherine Hodeir and Michel Pierre(1991)，以及*75 ans après, regard sur l'Exposition coloniale de 1931*(Paris: Le Mairie du 12e arrondissement), p. 31。

Internationale et des pays d'Outre-Mer)在法國第三共和總統加斯東·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主持下揭幕，博覽會會場位於巴黎市東緣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占地110公頃，工程歷時900天。博覽會開幕前一年開始，媒體終年不斷地每周報導工程進度。場內的展覽館舍複製了各個殖民地的重要建築，西非洲捷內的清真寺、柬埔寨的吳哥窟塔寺等等法國殖民地的代表性建築均按實物大小呈現在會場中。

博覽會接待處金門宮建於凡仙森林入口處，占地16,000平方公尺，是裝飾藝術(art déco)風格的現代建築。金門宮正面外牆面積達1,100平方公尺，牆面以浮雕呈現了殖民地帶給法國的豐富物產，如漁、絲、茶、胡椒、橡膠、銅、煤等等；接待廳內部600平方公尺的牆面，以壁畫展現了法國帶給其殖民地的美好事物，包括：科學、產業、商業、藝術、勞動、自由、正義、和平。建築西側牆面銘刻著如下的文字：「獻給那些延展了帝國精華，並由此使帝國之名在海外為人所愛慕的子民。心懷感激的法蘭西」。在這段文字旁，刻著對殖民事業拓展有功的人物姓名及職銜。

這場博覽會共售出門票3,350萬張，從5月到11月，在不到兩百天的會期中，參觀人數達八百萬人，其中400萬人來自巴黎及其近郊，300萬人來自外省，100萬人來自其他各國，11月15日閉幕當天參觀人數更高達50萬人，是巴黎在20世紀舉辦的最大規模的展覽。

博覽會除了展示殖民地的建築風貌，還展示了殖民地的人種。主辦單位在各殖民地徵募了1,500名「土著」，在會場中以土著村的方式呈現他們的工藝、舞蹈及「生活樣貌」。事實上，殖民地的人種及博物展覽早在19世紀便已出現。在1877年到1912年間，在巴黎動物園共舉辦了30次「民族學展覽」，每次都吸引了大量的民衆參觀。在1878年及1889年的萬國博覽會中都設置了「黑人村」，各展出了400名「土著」。這種將異邦的人類做為展示對象的做法，被稱為「人類動物園」(zoos humains)。歷史學家邦塞勒等(Nicolas Bancel et al. eds.)指出：

以種族主義的視野為基礎，以人類學的科學來證明其效度，這些民族學展覽代表了一種根本性的轉折，經由這種奇觀化的方式，達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媒體效應。人類動物園，這樣一種真正的大眾文化，著實建置了西方的他者關

airiti

係，因為對大多數的歐洲人和美國人而言，他們與異邦人（大多來自於殖民地）的首次接觸，是透過鐵柵、圍籬、隔欄進行的，這些柵欄將他們與那些「野蠻人」分隔開來。(2004[2002]: 6)

然而，展示「野蠻人」(sauvage)與殖民事業的原則並不相符，因為法國從事殖民事業所宣稱的使命正是要將野蠻人種轉變為文明人(ibid.: 13)。另一方面，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定位，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重大的轉變。「野蠻人」以其鮮血實現救贖，由此轉變為帝國的子民。殖民者必須以新的概念來替代「野蠻人」做為殖民地屬民的通行稱謂，這個新概念既要能夠說明帝國殖民文明事業帶來的教化轉變，又必須將殖民地屬民與母國人民區分開來，由此被提出的新概念是「土著」(indigène)(ibid.: 13)。殖民博覽會所要展出的，並非往昔的「野蠻人」，而是今日的「土著」。「野蠻人」，是殖民地和動植物並列的物種之一；「土著」，則是接受了帝國文明教化而處於轉變過程中的帝國屬民。前者被歸類在博物的範疇，後者被設想為朝向文明理想轉變中的次等人類。

歐洲現代文明將殖民地的人當成動物來展覽，背後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及文化關係已然值得我們探討。然而特別讓我們關注的是，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這麼多非洲殖民地的土著兵參戰，這麼多東南亞殖民地的人民參與兵工生產或戰地工事，思想界又已對現代文明及戰爭之惡提出反省，在此情形下，何以法國政府仍然組織了大規模的殖民博覽會？

距離1931年國際殖民博覽會十年之前，法國曾於1922年在南方地中海的馬賽舉辦「全國殖民博覽會」(Exposition nationale colonial)。在這場博覽會開幕後，報刊上曾有如下的報導：

在法國有座城市剛剛啓用一處治療中心，獲得超出宣傳所預期的成功。[……]人們在那裡所療癒的疾病是民族的懷憂喪志、失敗主義、自我懷疑、民族愁悶[……]這座城市，就是馬賽；而這處如此有益身心的治療機構，就是殖民博覽會。(轉引自Hodeir and Pierre 1991: 33)

十年之後，在1931年國際殖民博覽會的開幕式上，將殖民事業展示與民族自信心聯繫起來的論述繼續迴響。當時的法國殖民地部部長

保羅·雷諾(Paul Reynaud)強調：「這場博覽會的根本目標在讓法國人對他們的帝國產生意識。〔……〕必須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自己是跨越世界五洲的偉大法蘭西的公民」（轉引自Girardet 2005[1972]: 185）。

法蘭西殖民帝國發展的頂峰並非皇權時期，而是進入共和之後；不在與皇權鬥爭的第一、二共和時期，而在法蘭西共和體制已然確立，歐洲強權之間掀起民族主義對抗的第三共和時期(1871-1940)。從王朝轉為共和，殖民所拓展的文明事業，所帶來的富饒物產，從國王的榮耀轉變為民族的榮耀。

殖民史詩被呈現為一場真正的民族主義課程，殖民行動完全銘刻在共和國的價值中。法蘭西的文明使命位於這些措施的核心。在博覽會常設展館中陳列著法國在其帝國所實現的事情。雖然只有很小部分的殖民地人民看得到這些展覽，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讓眾人相信歐洲文明和法蘭西共和國的光輝照遍整個帝國。(Bancel, Blanchard and Vergès 2006: 112)

殖民博覽會所要界定的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但所要塑造的卻是民族國家與其人民的關係。民族國家體現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普同精神，殖民事業則推展了文明使命，體現了民族榮光。讓共和國人民在殖民博覽會中感受帝國殖民的成就，除了為殖民主義的正當性辯護，讓共和國人民支持殖民事業，更要在民族國家爭雄的國際局勢中，讓殖民事業的榮光促使人民擁護共和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交織出一場以「文明使命」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博覽會，讓殖民事業成為鼓舞民族主義情感的藥方。

### （三）記憶之所的流變與民族學博物館群的重組

殖民博覽會結束後，絕大多數館舍都被拆除，而原本就計畫要設為常設博物館的金門宮則留了下來，成為殖民到後殖民文化關係轉變的見證。在國際殖民博覽會期間，這棟被稱為「殖民地宮」(Palais des colonies)的建築，除了做為接待處，同時也設立了一座「殖民地博物館」(Musée des Colonies)，用以說明法國殖民征服的歷史及殖民地的一般狀況。11月15日博覽會會期結束，博物館隨之關閉。1932年，帕勒夫斯基(Gaston Palewski)受命籌設「殖民地與外法國博物館」(Musée

des colonies et de la France extérieure)；1933年12月1日，用來展示歷史及土著藝術的展區重新開放。1934年，勒布隆(Ary Leblond)接替帕勒夫斯基被任命為館長；1935年重新調整、增設了展示內容，並將機構名稱更改為「海外法國博物館」(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mer) (MAAO ed. 2002: 224)。

帕勒夫斯基及勒布隆分別代表對於殖民博物展示機構的兩種不同定位。帕勒夫斯基認為，位於巴黎市Trocadéro的民族學博物館<sup>7</sup>已經擔負起「法國殖民的民族學研究及呈現」，殖民地與外法國博物館應該「限定在呈現〔我們不同屬地的土著〕與法蘭西文明的接觸」（〔括號〕中的補述為原文所加）。而勒布隆則認為，海外法國博物館應該「將其理想限定並從屬於一種更為嚴格的國族需要，企圖成為法蘭西殖民人的博物館(le musée de l'Homme colonial français)，由此我們所指稱的是那些生於海外屬地者，以及受召喚從事其使命為母國服務的歐洲人(l'Européen)」(轉引自Murphy 2007a: 45-46)。根據莫菲(Maureen Murphy)的分析，帕勒夫斯基關注的重點是土著，勒布隆則是從法蘭西民族的文明使命來探討；前者討論的是帝國的屬民，後者則是從殖民者的行動來看被殖民者(ibid.: 46)。帕勒夫斯基希望締造的是一座「殖民科學的法蘭西學院」，其對象除了一般大眾之外，也包含了從事殖民工作的專業人員；但對勒布隆而言，這座機構應該依循殖民博覽會的定位，以一般民衆為對象，讓自己變成傳播殖民事業成就的工具(Murphy 2007b: 41)。然而即便兩位主事者對這個機構的定位有如此的差異，但兩者同處於殖民主義興盛的時期，他們對於自我和他者關係的表述都直接反映了這個階段的主導意識形態。不論是「殖民地博物館」或「海外法國博物館」，展示殖民地的人、事、

---

7 Trocadéro的民族學博物館創建於1882年，所在館舍投卡德侯宮(Palais du Trocadéro)因舉辦1878年萬國博覽會而興建，因舉辦1937年萬國博覽會而拆除。投卡德侯宮拆除重建後的新建築命名為夏佑宮(Palais de Chaillot)，西翼做為新創設的「人類博物館」(le Musée de l'Homme)館舍。人類博物館於1937年設立，1938年6月開幕，除了繼承原本民族學博物館的館藏，並整合了從「國立自然史博物館」(le Musée nationale d'histoire naturelle)移轉而來的人類學及史前史收藏。「人類博物館」的後續演變參見下文。



物，目的都是要宣揚殖民事業的成就；透過對邊緣地區的敘事，達成對於帝國中心的肯認；藉由區別與連屬的雙向邏輯，說明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的階序從屬關係。

二戰後的去殖民風潮，帶動了社群意識的重構，讓這座充滿帝國殖民記憶的博物館不得不重新定位。在當時文化部部長馬勒侯(André Malraux)的倡議下，「海外法國博物館」於1960年改設為「非洲與大洋洲藝術博物館」(le Musée des arts africains et océaniens, MAAO)，將從這些地區所蒐集的物當成藝術品來展出(ibid.: 47)。這種轉型所達成的，並不是將「殖民」和「民族學」的基因去除，而是開始賦予這些從殖民地蒐集來的物品以「藝術品」的地位。隨著機構更名及重新定位，金門宮由頌揚殖民成就的帝國宣傳機器，轉變成展示「原始藝術」(arts primitifs)的民族學博物館，用一種公開卻又隱晦的方式訴說著這些區域的民族學知識建構與殖民歷史的密切關係。

1990年，「非洲與大洋洲藝術博物館」改制為國立博物館，並將名稱調整為「國立非洲與大洋洲藝術博物館」(le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MAAO)。在之前的名稱中，非洲和大洋洲是形容詞，意味著這些藝術品被認為具有非洲或大洋洲的本質；在調整後的名稱中，非洲和大洋洲是名詞，意味著這些藝術品是出自這兩個地區，但它們各自有其多樣性及不同的歷史。調整前後的名稱乍看之下像是同一回事，但它所代表的是對這些文化區域的藝術品的不同認識。另一方面，1990年代的主事者也更注重帶入當代創作，讓這座博物館的藝術定位得以更加凸顯(ibid.: 47-48)。

21世紀初，由於外在環境變動、文化機構內在發展動力、國家領導人的藝術雅癖及歷史留名動機等因由的促動，法國民族學博物館群經歷了一連串大規模的重組。<sup>8</sup>「非洲與大洋洲博物館」與1938

---

8 1991-1998年間擔任人類博物館人種學實驗室主任的杜帕涅(Bernard Dupaigne)(2006)認為，巴黎博物館群的重組過程可以上溯到密特朗總統於1981年宣布的羅浮宮改造計畫，民族學博物館改組則可以回溯到1990年，當年收藏家Jacques Kerchache在解放報發表一篇宣言：〈讓全世界的傑作都能生而自由平等〉(Pour que les chefs-d'œuvre du monde entier naissent

年開幕的「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都於2003年關閉，兩館具有「藝術價值」的收藏品被轉移到2006年開幕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成為新館館藏定位「最初藝術」(arts premiers)的一部分。<sup>9</sup>另一方面，1937年設立以記錄保存法國傳統常民文化的「國立常民藝術與傳統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MNATP)於2005年關閉，<sup>10</sup>原本館藏移往籌備中的「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de l'Europ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MUCEM)。<sup>11</sup>

「布朗利碼頭博物館」及「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呈現了法國如何通過博物館的重組與創設，在博物展示的層面回應全球化與區域整合這兩個不同的文化趨向。<sup>12</sup>「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的任務在承認其他文明的藝術品之價值，創造一個能夠展現文化多樣性並讓文化交流對話的空間。<sup>13</sup>「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在歐盟成為歐洲各國新的社群認同框架的時代被提出，其敘事核心從法蘭西民族文化轉變為歐洲區域文明，讓原有的法國國族文化展示敘事能夠與歐洲認同接合。在全球化及區域整合的潮流中，重組後的新博物館群重新界

---

libres et égaux)，呼籲羅浮宮應該將收藏的藝術品範圍擴及非洲、美洲、北極、亞洲和大洋洲等歐洲之外的文化。席哈克總統於1992年與Kerchache會過後接受了此一想法，於1995年當選總統後，便決定建造一座以「最初藝術」為定位的博物館，展出因為博物館定位而無法在羅浮宮中展出的人類傑作。

- 9 經歷了館藏移轉爭議，人類博物館目前正在閉館整修，預計於2015年重新開幕。
- 10 關於「國立常民藝術與傳統博物館」(MNATP)設立與關閉過程的探討，參見Martine Segalen (2005)。
- 11 「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MUCEM)於2013年6月7日正式開館。
- 12 Bjarne Rogan(2003)認為「布朗利碼頭博物館」及「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分別代表了朝向後殖民博物館與後國族博物館的轉型。
- 13 席哈克總統於2004年接待亞美尼亞社群的國際訪賓時曾有如下的致詞：「在這個暴力、自大、不寬容和狂熱的時代，布朗利碼頭博物館將是法國對於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對話之信仰的一次新的展現」(De l'Estoile 2007: 10)。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於2006年6月21日舉行開幕研討會的主題即為「文化對話」(Le Dialogue des cultures)。此研討會內容參見Bruno Latour ed.(2007)。

定了法國與他者的關係：對於自身，以歐洲及地中海的空間定位來含括文明發展的時間敘事；對於他者，以象徵遠古的時間定位（最初藝術）來概括舊殖民地世界（遠外空間）的物質文明。

在一連串民族學博物館群重整的計劃中，「國立非洲與大洋洲藝術博物館」的展品遷離金門宮。然而金門宮的館舍建築還在，充滿殖民風味的浮雕、壁畫還在。即使原本的展室已然空盪，殖民記憶依舊盤桓。



圖3：金門宮立面浮雕。（陳瑞樺攝）

## 四、一座移民博物館的誕生

### （一）移民博物館的倡議與籌備

在非洲及大洋洲博物館關閉一年後，金門宮又因為被選為籌備中的「國立移民歷史城」館址而進入另一階段的記憶重構過程。

事實上，早在1989年就有歷史學者及社會人士共同籌組「移民博物館促進會」(Association pour un musée de l'immigration)。當時移民史研究才剛浮現，仍然是「未被認定的學術課題」(objet académique non identifié)。第一部以移民為主題的法國史著作《法國熔爐：19~20世紀移民史》(*Le Creuset français.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XIXe-XXe siècles*)甫於1988年出版，作者諾瓦里耶爾(Gérard Noiriel)轉用諾哈的「記憶之所」概念，將第一章的標題訂為「記憶無所」(non-lieu de mémoire)，以揭示當時法國史學界對於移民課題的忽略及陌生。<sup>14</sup>

在學院之外，協會團體也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關注移民課題。以保存法國及歐洲的移民歷史和記憶為宗旨的Génériques協會於1987年成立，於1989年籌劃了一場以「外國人的法國，自由的法國」(France des étrangers, France des libertés)為主題的展覽。紀錄片導演拉亞烏伊(Mehdi Lallaoui)開始重建北非移民的記憶，執行這項影像計畫的協會，其名稱正是「以記憶之名」(Au nom de la mémoire)。在此之外，許多協會團體也陸續加入發掘法國做為移民之地的記憶(El Yazami and Schwartz 2001: 3; Bernard 2008: 5)。

1998年法國代表隊贏得世界杯足球賽，隊員的膚色「黑、白、褐」(black-blanc-beur)被用來類比法蘭西國旗「藍、白、紅」三色，以做為共和國成員組成的新象徵。記者貝爾納(Philippe Bernard)和歷史學家韋爾(Patrick Weil)趁此機會寫信給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建議他提出籌設移民博物館的計畫。若斯潘正面回覆了提議，並將草擬計劃的任務交給文化部博物館司(la Direction des musées)，但博物館司以缺乏適合館藏、民衆沒興趣等理由將計畫擱置。眼看時間流逝，關心此案的民間人士建議政府先做可行性評估。若斯潘聽從建議，委託Génériques協會的總代表埃爾亞札米(Driss El Yazami)及最高行政法院國務委員(conseiller d'Etat)施瓦茲(Rémy Schwartz)進行可行性評估。

---

14 事實上，這種忽略相當大程度源於歷史學界對於法國史所建立的史觀及史學知識傳統，也因此，一旦移民成為觀看歷史的視角，必然會導致國史敘事的變動。

2001年11月，兩人交出了〈國立移民歷史及文化中心創設研議報告〉(Rapport pour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national de l'histoire et des cultures de l'immigration)。

2002年總統大選，若斯潘在第一輪選舉中意外被淘汰，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及極右派國家陣線(Le Front National)候選人勒班(Jean-Marie Le Pen)對決。國家陣線向來以對於移民抱持嚴厲態度而著稱。第二輪選舉時，席哈克在左右派選民共同防堵極右派的情勢下，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總統。席哈克當選後，對移民博物館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新任總理哈法漢(Jean-Pierre Raffarin)於2003年4月10日召開「跨部整合委員會」(Comité interministériel à l'intégration)，提出「移民資源及記憶中心創設研議專案」(Mission de préfiguration pour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de ressources et de mémoire de l'immigration)，由曾經在1993-1997年間接連擔任文化部長及司法部長的都蓬(Jacques Toubon)主持。

都蓬領導的專案組參考先前報告書的研究成果，運用既有的「跨文化關係發展局」(l'Agenc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relations interculturelles, Adri)<sup>15</sup>的人力物力，結合學界及民間團體，經過一年多的研議，於2004年6月提出報告書，將未來的移民文化機構定位成一個結合博物館、資源中心、藝術展示中心、文化活動場所以及國際研究網絡的複合文化機構。2004年7月8日，總理正式宣布設立「國立移民歷史城」(CNHI)，由都蓬擔任籌備處主任，館址選定在已經騰空的金門宮。<sup>16</sup>

何以這座以移民史為主題的文化機構不以Musée (博物館)為

---

15 「跨文化關係發展局」(l'Adri)是由國家於1977年設立以「促進外籍人口的整合」。自1996年起，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轉為提供資源給法國及歐洲從事促進整合活動的行動者。

16 對於這段歷史過程的說明，參考國立移民歷史城網頁〈一項孕育多年的計畫〉(Un projet en germ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http://www.histoire-immigration.fr/la-cite/historique-du-projet>。另見Marie-Claude Blanc-Chaléard(2006)及Philippe Bernard(2008)。

名，而要定名為Cité呢？Cité意為城邦，在當代法國的脈絡中，也指城市郊區由大型集合住宅所構成的居住區。以Cité做為移民文化機構的名稱，直接宣示了這項計畫與社群建構之間的聯繫關係。然而在都蓬呈給總理的報告(Toubon et al. 2004)中，建議使用的名稱是musée。之所以會採用Cité而非musée做為機構名稱，首先是為了回應博物館主管機關文化部博物館司的顧慮。對文化部博物館司而言，此前所有國立博物館在設立前都已經有既存的收藏品，<sup>17</sup>但「移民」究竟有何物可供博物館收藏，這是文化部博物館司所質疑的問題(Blanc-Chaléard 2006: 133)。負責撰寫移民博物館創設可行性報告的埃爾亞札米對此問題有直接的批評：

在先期作業階段與CB<sup>18</sup>的討論中，〔CB〕宣稱無法想像要建造一座移民博物館但卻沒有收藏。因為，在其觀念中，並不存在與移民史或移民文化相關的收藏品：沒有繪畫、沒有可供展示的藝術……〔CB〕對於移民抱持著一種古典的經濟性見解，在此見解中，移民的行動者是文盲、沒有工作……就如沒有文化。很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把博物館這個詞賦予這項計畫會是一場戰役，這場戰役所關涉的，正是對於我們所討論的人群的眼光。（轉引自Cohen 2007: 404）

正因為文化行政部門對於Musée這個詞彙抱持著一種正典的(canonical)觀念，因此是否能以Musée為名，就涉及了兩種不同的意義：或是將以Musée命名當成是獲得國家文化行政體系承認的標誌，或是將Musée這個名稱視為充滿老舊僵化觀念的表徵。無論如何，最後的結果是以Cité來命名。根據參與創設計畫的委員貝爾納(2008: 8)的說法，Cité這個名稱讓人覺得較博物館更有生氣和活力，也讓移民博物館的推動者得以迴避與文化部博物館司在觀念上的衝突。<sup>19</sup>

---

17 Marie-Hélène Joly：「在國立博物館中，這是唯一一座能夠自誇是在沒有既有收藏的情況下所創立的博物館，但也因此必須直面『空白的眩暈』」。

（轉引自CNHI 2009: 8）

18 CB為原文作者使用的代稱。

19 2012年1月1日的行政定位調整，將國立移民歷史城和位於金門宮地下室的水族館合併為金門宮公共機構(l'Établissement public du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在此之前，移民歷史城與水族館雖然都在金門宮，但兩者的行政

## (二) 從殖民記憶邁向移民記憶

然而可能會產生衝突的並不只是「博物館」這個名稱，還有金門宮所負載的殖民歷史與「國立移民歷史城」的移民記憶兩者性質的衝突。新創機構可以透過選擇不同的命名方式來達成妥協，但既有館舍在過往歷史中承載的意義卻無可迴避。

歷史學家格林(Nancy Green)曾經擔任國立移民歷史城的歷史委員會成員，她比較了美國的埃利斯島(Ellis Island)移民博物館以及法國的CNHI，經由檢視籌設過程各項決策所做的選擇，來探討這兩間移民展示機構所帶出的歷史、記憶、遺忘等課題。相較於美國埃利斯島的移民博物館以歐洲移民為主要展示對象，在法國，後殖民移民（特別是阿爾及利亞移民）變成整體移民的代表，而歐洲移民的再現則被極小化。移民博物館的籌設，正是一連串包含和排除的過程。由此作者(Green 2007)提出：

移民史學家經常主張，過去的知識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現在。但是記憶這門課向我們顯示，不只過去解釋了現在，更常發生的是，現在解釋了過去。CNHI嘗試重新將歷史的力量安插在記憶之上，然而就如同所有形式的歷史書寫和記憶，如同埃利斯島的移民博物館，CNHI必須就何人(who)、何時(when)、何事(what)等問題做出選擇。

在記憶和遺忘的對偶關係中，「遺忘」其實是一種譬喻，它所指涉的毋寧是經由忽略及沉默造成某些歷史經驗在公共場域中變得不可見。這種忽略及沉默會形成某種精神分析上的壓抑作用，並且就如精神分析理論所揭示的，受到壓抑的事物往往會在未來的生命過程中回潮。1980年代末期以來法國社會所經歷的，首先是移民記憶的回潮，接下來是殖民記憶的回潮，這也正是「記憶之戰」之所以發生的社會

---

各自獨立。2013年7月，「國立移民歷史城」(CNHI)對外識別標誌更改為「金門宮 / 移民歷史博物館」(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 Musé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更動之前是以Cit  做為對外的識別標誌，金門宮則是CNHI所在的館舍，兩者的象徵為表裡關係；更動之後，金門宮與移民博物館變成上下層級的包含關係，並且共同做為對外的識別標誌。為了適切地呈現這段歷史過程及其意義的辯論，本文標題仍以原名「國立移民歷史城」稱之。

心理背景。在「記憶之戰」的時代氛圍中，並非每種傷痛的記憶都可以通過遺忘來處理，在遺忘之外，更需要記憶的轉化工程。殖民記憶，便是難以遺忘而必須加以轉化的記憶。

格林認為，法國的CNHI計畫比美國埃利斯島的移民博物館計畫更具野心，也更為困難。「埃利斯島博物館紀念一個移民實際發生的場址，它的力量在回溯過去移民的腳步，從抵達開始，經過等待的焦慮，經過身體檢查，進入美國。博物館的核心就環繞著接待大廳本身來建造。」而金門宮被選為館址是因為它做為歷史紀念建築的鮮明特性，但結果是這座博物館必須建構自己來對抗(against)它設立其中的建築物，而不是如同在埃利斯島一樣，借助(thanks to)所在的館舍建築(ibid.: 243-244)。

接續格林的分析，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金門宮這座承載了殖民記憶的宮殿(Palais)，要如何才能轉化為承載移民記憶的城邦(Cité)？要將金門宮這座具有爭議性的殖民記憶之所轉換為移民記憶之所，需要的不只是一場開幕儀式來改換空間的名稱，而必須安排各種具有儀式意義的活動來轉換這個空間原本負載的社會屬性。

2006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日當晚，國立移民歷史城籌備處舉辦了一項意味深長的活動。沒有煙火，而是以說書劇的方式誦讀馬提尼克詩人塞杰爾(Aimé Césaire)的名著《殖民主義論》(*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為了解理解這項活動企圖傳遞的訊息，讓我們閱讀以下這段由館方摘錄印在活動宣傳單上的著作內容：

首先要研究的是殖民如何將殖民者去文明化，讓殖民者變蠢，使其墮落，喚醒其潛藏的本能，喚醒其貪婪、暴力、種族仇恨、道德相對主義。並且首先應該顯示，每次在越南有顆頭被砍，有隻眼枯乾，而在法國人們卻安然接受；每次有位小女孩被強暴，而在法國人們卻安然接受，便有一種文明的成果，以其死亡的重量沉沉重壓，便有一種共同的倒退在進行，一種潰瘍在留駐，一種感染源在擴展。在所有這些暴行的盡頭，所有這些謊言的盡頭，所有這些被容忍的討伐、被拷問的囚犯、被折磨的愛國者之盡頭，在這種被鼓勵的種族傲慢、被展示的狂妄之盡頭，有種毒素被注入歐洲的血管中，野蠻在歐洲大陸緩慢而確切地進展。



聽塞杰爾控訴殖民主義，翻轉殖民者所界定的殖民與文明的關係。通過承認法蘭西的歷史錯誤來滌罪，從而在記憶之所的重構過程中，與共和國內部來自前殖民地的移民進行一場精神性的和解，這項活動所體現的正是一場國族的精神治療。就在這一天，前殖民地宮的大門象徵性地關閉，名義上是為了進行國立移民歷史城的裝修，然而各項工程早已如火如荼地進行了好一段期間，於是我們知道，關閉大門與裝修館舍都只是一種說法，真正重要的是透過這場儀式，將曾經被用來表彰殖民成就、由此負載了殖民罪惡的宮殿，轉換為體現移民貢獻與訴說移民遭遇的城邦。

在《殖民主義論》誦讀活動兩個月後，國立移民歷史城籌備處於9月28-30日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主題為「歷史與移民：殖民問題」(Histoire et immigration: la question colonial)<sup>20</sup>。這也是國立移民歷史城所舉辦的第一場學術研討會，即便在舉辦當時，國立移民歷史城尚未開幕。研討會的徵稿啓事(2005)說明了主辦單位企圖釐清殖民與移民兩者關係的用意：

如果說國立移民歷史城希望處理法國兩個世紀的移民，那麼殖民及後殖民移民就構成其對象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要辦理一場國際研討會和舉辦一場特展來探討這個課題。

移民史不能化約為殖民史，因為有一大部分的移民來自歐洲。反之，殖民史遠遠超過移民的框架。殖民造成了其他不同於遷移的效果。

國立移民歷史城，其使命在傳播移民的知識，必須釐清這兩個時期和歷史現象之間的關連。實際上，移民不只位於當前各種辯論的核心，同時也是各種混淆的來源。它與殖民過去的關係正是其中之一。各種人文及社會學科或是探究於此，或是探究於彼，而我們所要鼓勵的是將兩者對照來看。

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根本地反省殖民和以移民為主要面向的人員遷移這兩者之間的關連。

---

20 在徵稿公告中所訂的研討會名稱為「19及20世紀的殖民、去殖民與移民」(Colonisation, décolonisation et immigration aux 19<sup>e</sup> et 20<sup>e</sup> siècles)。這場研討會的論文集出版為：*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et question coloniale en France*(Green and Poinsois eds. 2008)。

從誦讀活動到研討會，先透過充滿張力的文本承認殖民和移民的關連，再透過研討會來探討兩者的關連，原來隱晦流動的問題被清楚地揭示，繼而被釐清。只有在揭示、釐清之後，才能翻過這頁痛楚的歷史。它所要達成的不是遺忘，而是要在吸納痛楚之後獲得新生，讓接下來的世代能攜手往前走。

經過三年籌備，國立移民歷史城於2007年10月10日開幕。如果殖民地宮是共和國的一塊歷史痛處，那麼移民歷史城就是用來治療殖民歷史傷痛，進而重新界定移民與法國的關係，以尋求國家整合的文化政治計畫。金門宮從殖民地博物館遞變為移民歷史城的過程，同時也是法蘭西帝國的殖民地屬民，從土著轉變成前殖民母國移民，再從移民轉變成法蘭西共和國公民的過程。

### （三）國立移民歷史城的定位

文化機構從來就不是中性的，它總是負載了各種訊息。國家的文化機構，也就負載了國家所要傳遞的訊息。關鍵在於訊息的內容是什麼？它所要引導生產的是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然而即便是國家的文化機構，它所傳遞的訊息並非自始就是清楚且不變的，特別是移民博物館這樣一個新的文化機構，它的定位是由政權掌握者、參與籌設的學者、人民團體、行政部門等不同的行動者，在歷史局勢中不斷地折衝協調才得出。這時的機構定位及展示敘事，雖然不一定能說明該社會對於我群與移民之間關係的一般性理解，但卻可以視為政治及文化菁英希望引導社會大眾追求的理想狀態。

以下要整理國立移民歷史城自2001年研議以來，不同行動者在不同階段對此移民文化機構所提出的定位說明，由此呈現不同行動者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而理解設立國立移民歷史城所企圖引導生產的社會關係。

首先讓我們看埃爾亞札米和施瓦茲2001年提交給若斯潘的〈國立移民歷史及文化中心創設報告〉，其中說明了此一機構能夠傳遞給參觀者的十項訊息(El Yazami and Schwartz 2001: 9-10)：

1. 移民是普遍的、持續的現象，是社會進步和豐富的因素。
2. 法國一直都吸引著外國人的移入。一百五十年來，法國是一方偉大的、歐洲最主要的移民土地。
3. 法國的移民是國家歷史的一個構成部分。
4. 移民一直都對國家的文化、經濟、國防做出貢獻。
5. 不分原籍對外國人進行整合，是法國整合模式的特點之一。
6. 不管是由經濟的或政治的動機所引起，移民都是一個傷痛、困難、複雜的過程，它同時涉及移居者和接納的社會。
7. 法國的移民歷史並非一條「平靜的長河」。交替於慷慨和退縮等不同時期是其特點。
8. 移民是決定法國與移民來源國的外交、文化與經濟等各項連結的性質及品質的構成要素之一。
9. 對於法國移民歷史及實際整合過程之分析，必須以對殖民史的參照為前提。
10. 今日法國的移民政策逐漸整合到申根空間及歐盟裡；它整合到一個已然全球化的移民系統中。

政權輪替後，哈法漢總理於2003年3月10日寫給都蓬一封正式委託信，請他著手規劃「移民博物館」，信中提出如下代表法國政府立場的說明（參見Toubon et al. 2004:7）：

這座未來的資源中心其首要使命，將是改變對於移民現象的眼光和心態，包括抵達者及其後輩的觀點，以及接待社會的觀點。透過這項計畫的界定，對於法國與共和的「某種特定觀念」將會受到影響。對於由移民出身的這些世代的法國人，特別是對那些有時會處於不利認同境況之中的最晚近的世代，這尤其是要向他們提出的重要訊號。

埃爾亞札米和施瓦茲2001年的報告將傳達的重點放在法國與移民的關係，更確切地說，是「法國的移民性」。2003年哈法漢總理的委託信中對於移民資源中心的使命所做的說明，則特別強調將移民後代做為重要訴求對象。雖然兩者都理解這個機構的對象是社會大眾，包括不同時期來到法國的新舊移民，然而埃爾亞札米等人要說明「法國的移民性」，其主要對象是未能體認到自己也是出身自移民的法國人；相對而言，在總理的心中，被主流社會指認為「移民」的晚近世代是他更為關注的重點。

承接哈法漢總理的託付，都蓬在《移民資源及記憶中心設立研議專案：呈總理報告》(*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Mission de préfiguration pour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de ressources et de mémoire de l'immigration*)的前言以〈移民在建設法國中的位置〉(*La place des immigrés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a France*)為題，提出如下的訊息：

這項對於移民人口在共和國命運中的位置所做的必要的承認，可以協助每位法國人對今日法國的認同抱持一種真實的眼光，並得以環繞著形成國族力量的價值，與國族的不同構成部分進行和解。這是「設立移民資源及記憶中心研議專案」所做各項工作的目標，也是本報告的意義所在。(ibid.: 9)

接下來報告的導論說明了這項計畫的關鍵課題：

這座未來的法國移民歷史及文化博物館的關鍵課題很明顯地是象徵性的：它必須將移民問題從慣常被框限的社會問題或政治爭議的視角中脫離出來。我們所選擇的是歷史取徑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銘寫移民的歷史，不只是做為社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要做為法國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來看待。(ibid.: 13) (粗體為原文所加)

籌設計畫通過後，國立移民歷史城在籌備階段印發的文宣(CNHI 2006)中說明，移民歷史城的定位是「一個文化的、教育的、公民的機構，目的在承認並強調移民在法國的建設中所占有的地位。」館方所要傳遞的訊息，在以下這段文字中有清楚的說明：

自從兩個世紀以來，在法國，數百萬男女進入我們的國家，在此定居，他們或是受壓迫者，或是為了尋求工作，或是因為熱愛自由。他們之中有的人是在企業或國家機構的徵求下前來，付出心力，整合進這個國家，並且對國家建設做出具有決定性的貢獻。此一過程深受在歐洲以及前被殖民國所發生的事件所烙印，它不只是當代的，也是持續的過程：今日法國外籍人士的比例仍與百年前相同，每五位法國人當中就有一位祖父母是外國籍。

交付給國立移民歷史城的任務，正是要對每個人在共和國命運中的位置做出必要的承認。承認移民在法國的國家和社會建設中的位置，承認法國做為移民國度此一真正的性質，承認我們歷史和我們記憶的多重性格，承認有著陰影和光亮、失敗和成功、幸福和悲劇的真正歷史。

在開幕時發給媒體的資料中(CNHI 2007: 3)，國立移民歷史城將自己的使命界定如下：

〔國民移民歷史城〕它所承載的使命在匯集、保存、表彰、讓民眾得以接近法國自19世紀以來的移民史相關要素，由此有助於肯認法國社會中移民人口的整合歷程，並推進法國對於移民的眼光及心態。

上面這段文字也刊載在國立移民歷史城的網站上，<sup>21</sup>並在日後其他文件中被引述，因此可視為國立移民歷史城對自身使命所提出的正式說明。

最後，讓我們檢視都蓬於2009年在《國立移民歷史城常設展指南》的序言中所做的說明：「認識及肯認法國在過去兩個世紀的移民史，由此改變當代對於移民的眼光並貢獻於整合政策，這就是國立移民歷史城的使命」（CNHI 2009: 2）。

在上述這些由不同行動者在不同時間點提出的界定，所呈現的究竟是首尾一貫的觀點，還是不同的主張？

史蒂芬(Mary Stevens)考察了CNHI從籌備階段到開幕的論述轉變，指出籌備團隊最初主要是藝術史背景的成員，之後隨著移民史和移民政策研究者的加入，籌備團隊逐漸調整語彙，避免使用「整合」(intégration)這個字眼，這是因為「整合」做為官方的主導意識形態，已經成為負載了負面觀感的字眼。因此她認為，「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座博物館以和原本構想相反的方式在運作，它並未做為國家打造公民的工具，而是做為公民社會行動者觀點滲透到官方論述的導管」(Steven 2008: 64)。然而從上述文獻回顧中，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在2001由民間協會與政府共同撰寫的評估報告中、在2003年總理的委託信中、在2007年的開幕新聞資料中、在2009年的常設展指南中，「整合」都被當成是一項重要的原則而被強調。史蒂芬所說的情形發生在2004年的報告中，以及2006年尚未開幕前所發的文宣中。在2007年開幕後館方的論述，延續2001年創設報告的基調，將法國的整合、對移民的承認、改變對於移民的眼光這三件事連結在一起，但2001年強調

---

21 CNHI 網站頁面：「Le Projet de la Cité」。http://www.histoire-immigration.fr/la-cite/le-projet-de-la-cite。（2013/08/13瀏覽）

了移民對於建設法國的貢獻，到2007年調整為承認移民的整合歷程。

移民博物館的設立計畫，一開始便是在協會組織及學者的呼籲下進行的，並且學者也是籌備團隊學術委員會(le conseil scientifique)的主要成員，因此他們的意見得以在移民博物館的陳述中呈現；但在另一方面，在政治人物所做的各種官方序言及宣告中，按照共和(République)的精神，以普同公民權為基礎對不同來源的移民進行整合，仍然是移民博物館在擬定所要傳遞訊息的基本綱領。

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使命以及它所要傳遞的訊息，從2001年研議到2007年開幕，其主軸一直未曾改變。即便期間經歷了政權輪替，不同的政治領導人所做的僅是在其發言中強調某些訊息，而非更動計畫初始所界定的使命。<sup>22</sup>學者及協會人士關注的重點在改變法國社會看待移民的眼光，而政治人物則關注於移民的整合；前者關注於法國社會與移民的關係，後者關注於移民如何看待自己與法國的關係。然而這兩方面在最初的討論中就都已涉及，移民歷史城最後呈現的敘事，是以前者來包含後者，在呈現法國社會的移民性的同時，也試圖讓戰後主要來自北非和黑非洲的前殖民地移民之後代，將自己家庭與族群的經歷放在法國兩百年來的移民歷史中來理解，從而將自我的特殊性相對化。

綜上所述，國立移民歷史城的使命在轉換法國社會看待移民的視

---

22 即便國立移民歷史城的使命界定及所要傳遞的訊息一直沒有改變，但並不代表它在開幕後就能得到政府的支持。2007年適逢法國總統大選，右派政黨人民運動聯盟(l'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候選人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為了爭取極右派選民的選票，允諾當選後將設立「移民、整合、國家認同與共同發展部」(le Ministère de l'immigration, de l'intégration,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et du Co-développement)。然而將「移民」與「國家認同」連結，也就意味著移民會對國家認同造成問題，這種對於移民的負面看法正是移民博物館計畫所試圖導正的。薩科齊於2007年5月16日就任法國第五共和第二十三任總統，兩天後(5月18日)「移民與國家認同部」成立，由奧爾特弗(Brice Hortefeux)擔任部長，同日國立移民歷史城的學術委員會(le conseil scientifique)當中八位學者宣布辭去職務。10月10日國立移民歷史城開幕當天，薩科齊總統及移民與國家認同部部長均未出席。

角，從過往被視為社會問題的、帶有污名化效果的理解方式，轉而認識移民對於建設法國所做的貢獻。理解移民現象，轉換對於移民的視角，也就在轉變民衆觀看法國的視野，重新理解法國社會的成員構成性質，認識到移民不只是法國的一種社會現象，甚且是法蘭西國族的構成基礎。從而移民歷史城所要述說的不只是做為社會史一環的移民史，甚且是由移民史為敘事軸線的法國史。

## 五、思索「移民博物館」

正如筆者在說明本研究的思考脈絡時所述，移民博物館是我們用來考察當代社群關係變動的表徵，探究移民博物館是什麼，目的在理解當代社群關係的變貌，由此思索擁有不同文化背景及歷史經驗的人群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這是筆者將移民博物館放在「從殖民到移民」這整個歷史過程中考察的原因，也是本文之所以要探討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此一個案的用意。對移民博物館的討論，其核心正在於認識「移民社會」是什麼？它有何性質？有何表現？會遭遇何種課題？

法國的經驗告訴我們，移民認同問題的浮現，並非發生在第一代移民身上，而往往是到了第二代成長之後，由於承繼了上一代所受到的歧視和所被烙印的污名，才將上一代被壓抑失聲的生命經驗及自己所經歷的認同糾葛，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由此形成具有世代意義的社會風潮。另一方面，移民做為「他者」，往往成為排外政治主張乃至暴力行動的對象。由此，移民現象聯繫了後殖民、種族主義、社群主義、公民權、多元文化、國家認同等等一系列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問題叢結。移民博物館，正是為了回應先前環繞移民產生的課題而設立的文化治理機構，它試圖透過展示敘事，引導社會大眾看待移民的視角，由此改變民衆對於我群及他者關係的認知。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移民博物館的展示敘事所指涉的對象，並非特定歷史時期遷入的族裔群體（例如北非或黑非洲的後殖民移民），而是在各個歷史時期遷到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的移民整體。一旦我們

將展示敘事限定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群體，那麼這所博物館就會從「移民博物館」轉變成「族群博物館」。

「族群博物館」是多元文化政策及本土化社會氛圍下的產物，做為一個整體現象，其邏輯在肯認不同的歷史群體及其文化認同。族群博物館以其總體的存在反映了多元文化的社會事實及政治指向，但單個族群博物館本身並不傳遞多元文化的訊息，它所傳遞的是某一族群的發展歷程及文化內涵。那麼究竟「移民博物館」是什麼呢？它是基於什麼邏輯在安排敘事軸線與展示架構呢？借鏡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案例，<sup>23</sup>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項原則：

1. 「移民博物館」是以人群的流動與定著為敘事軸，而非以族群的延續與發展為敘事軸。
2. 「移民博物館」的歷史敘事是以地為軸，而非以族群為軸。它所要述說的並非某個特定族群如何在歷史過程中發展，而是一方土地如何在不同時期接納了不同的歷史群體。
3. 「移民博物館」是以國家(Nation)為主要的敘事架構，而非以族群為敘事架構。它所要述說的，是不同的歷史群體如何構成這個國家。在此敘事架構中，個別族群被相對化，先到族群認識到自己的「移民性」，從而有助於減少對於後到群體可能產生的排斥。
4. 雖然「移民博物館」的歷史敘事是以地為軸，以國家為主要架構，但它的關懷基點並非做為民族國家整體表現的國土，而是人。是在不同歷史時期進到這方土地的人。

不可諱言的是，以國家為主要敘事架構和以人為關懷基點，這兩者之間並無法各自推展而不發生衝突。前者關注於國家的整合，後者關懷移民的生命際遇和生存境況；前者內含了社群邊界的概念，後者則要將人道關懷無差等地推到所有移民身上。正因此，法國在界定國

---

23 此處借鏡法國，並不意味著要以法國做為標準，而是以法國做為思考相關問題的參照。



立移民歷史城的使命時，不同行動者才會在共通基礎之外，各自強調不同的面向。

那麼「移民博物館」是否會落入以「國族」思維來替換「多元文化」思維的陷阱呢？<sup>24</sup>「移民博物館」只是一座機構，這座機構會傳遞什麼樣的訊息，有賴於籌備者和主事者的視野和心胸。然而移民博物館的誕生，其目的正在承認移民的經驗和貢獻，進而改變看待國史的眼光。在當前世界的脈絡中，設置移民博物館的基本用意，不是為了鞏固某種根源性的、固著不變的國族認同，而是為了承認移民的經驗和貢獻，以接納的態度來看待移民，用動態的眼光來理解國族<sup>25</sup>的構成。

如前所述，雖然族群博物館的設立是基於多元文化論的思維，但它的展示邏輯並不傳遞多元文化的觀點，而是族群文化的觀點。多元文化思維只有在不同的歷史群體並置，從而將所有族群都相對化時才可能顯現。是否會落入以「國族」思維來替換「多元文化」思維的陷阱，關鍵在於將各個歷史群體並置的過程中，是否進一步主張做為整體的國家具有相對於個別歷史群體的優先性。這一點，正是從1931年「殖民地博物館」到2007年「國立移民歷史城」此一轉變過程在社群意識上產生的重要分野。

「殖民地博物館」展示了來自各殖民地的文物，目的在以殖民地的奇異來烘托殖民母國的普同，以海外領土的富饒來展現法蘭西民族的光榮，此時多元文化表現為以殖民母國為中心在不同時空群體間所形成的階序關係。相對而言，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的常設展中並沒有展示個別族群的文化，只有個別移民的記憶；族群文化，隱身在個人身上；族群，並非依其文化內容而被界定的文化群

---

24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複雜之處不僅在於其答案，並且表現在設問本身。法國主導政治生活的是共和原則，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與共和原則之間不無矛盾，也因此存在著一定的緊張。但在台灣，由於反國民黨黨國統治及中國國族主義文化霸權的歷史經驗，多元文化主義具有高度政治正當性。這裡根據台灣語境所提出的問題，在法國的問法可能會反過來，變成「移民博物館是否會落入以多元文化主義替代共和原則的陷阱？」

25 這裡的「國族」，是指由一國之國民所構成之整體。

體，而是在不同時期來到這片土地的歷史群體。國家，是由不同時期的移民所構成。

如同殖民與移民兩者雖然緊密相連但卻不重疊，國族的構成也無法盡述移民的現象，因為還有許多移民並未取得公民資格。移民博物館的存在，不只說明了國族的構成，更超出了國族的框架。移民博物館的關懷基點在於人，那些在歷史命運及世界局勢變動中流移的人。轉變觀看移民的視角，同時也是對國族構成方式的再認識，以及對於自身位置相對性的理解。它所試圖通往的，是對移民經驗某種共同性的感受，以及由此而來的一份悲憫體諒之心。這份心意，正是共同生活得以可能的重要心理基礎。

## 六、結論

回到前言中提出的問題，在人事物快速頻繁流動的全球化時代，原本在時間（遠古／現代）、空間（遠外／本地）、社群（自我／他者）三者之間的換喻關係會產生什麼樣的轉化？本文以博物館做為社群關係的表徵，考察法國於21世紀前十年發生的民族學博物館重組及移民博物館創設，以此說明我群／他者關係在全球化時代產生的轉變。

對法國這樣一個前殖民帝國，時空換喻首先表現為民族學家及殖民官員前往遠外的地區以探索「人類的過去」，進而將他者帶到殖民母國展示，這些「他者」先是被界定為「野蠻人」，繼而被界定為「土著」。法國舉辦國際殖民博覽會的1930年代，同時也是黑人知識分子前往殖民母國攻讀高等教育，以及黑人歌舞成為流行文化的時代。1931年的國際殖民博覽會建造了金門宮，其館舍隨著歷史由殖民到去殖民而不斷變換其定位。在二戰後到1960年代的去殖民階段，許多前殖民地的人民前往法國尋求工作機會，產生為數眾多的殖民與後殖民移民，使得原本在外部發生的異族遭逢，或是在本國零星出現的外來者，轉變為法國社會的構成內容。而後在21世紀民族學博物館群重組過程中，金門宮先是成為展示內容暫時被抽空懸置的「記憶之

所」，而後國立移民歷史城的設立計畫重新為這方記憶之所賦予新的意義。金門宮從殖民地博物館到國立移民歷史城的流變過程，同時也是法蘭西帝國殖民地屬民，從土著轉變成前殖民母國移民，再從移民轉變成共和國公民的過程。

人類學家德雷斯托勒(De l'Estoile)在探討法國近年博物館的重組經驗時，曾經按照認同關係將博物館區分為「自我博物館」(musées de Soi)與「他者博物館」(musées des Autres)這兩大類。「自我博物館」要回答如下的問題：我們是誰？它的展示所設定的對象包括外來訪客和自身社群，但透過展示所要強化甚至建構的對象是後者。在透過展示來建構自我的同時，也肯認了紮根於共同過去的集體認同。與此相對，「他者博物館」所展示的是那些被界定為與自我不同的事物，也就是源於遙遠地方的外來事物。展示他者的事物，目的在回答如下的問題：誰是他者？換言之，他者是什麼樣子？(De l'Estoile 2007: 11-13)德雷斯托勒認為，國立移民歷史城所呈現的是「他者」(移入的外國人)逐漸整合到「我們」(法蘭西國族)的方式(ibid.: 14)。

從人類動物園展示野蠻人，到殖民博覽會展示土著；從殖民地博物館展示殖民帝國的文明教化事業，再到非洲與大洋洲博物館展示遠外民族的藝術，金門宮這方記憶之所一直是法國在呈現自我與他者關係的表徵；精確地說，是法國如何看待他者的博物櫥窗。然而移民博物館的計畫全然地改寫了我群與他者的關係。它所呈現的對象並非「他者」，而是「我們」。從「他者」到「我們」的視角轉換，也就是從「族群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理解，轉而用「移民社會」來界定自身所處社會的性質。對移民博物館的討論，其核心正在於認識「移民社會」是什麼。

本文的目的不在鼓吹設立移民博物館，而在透過移民博物館思考什麼是移民社會。博物館是社群關係經過層層轉化之後凝聚而成的表徵。移民博物館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自我／他者關係，自我前往遠外成為他者，原本遠外的人變成了我群的社會成員。移民，既是自我變成他者，也是他者逐漸變成我群的過程。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Nora, Pierre (諾哈) 編，戴麗娟譯。2012。《記憶所繫之處》(三冊)  
(*Les Lieux de mémoire*)。台北：行人出版社。
- 戴麗娟。2012。〈譯者導言〉，收錄於《記憶所繫之處 I》，Pierre Nora  
(諾哈) 編，戴麗娟譯，頁7-13。台北：行人出版社。

### 二、外文書目

- Ageron, Charles-Robert. 1984. "L'Exposition coloniale de 1931. Mythe républicain ou mythe impérial ?,"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La République*, edited by Pierre Nora, pp. 561-591. Paris: Gallimard.
- Bancel, Nicolas et al. eds. 2004(2002). *Zoos humains. Au temps des exhibitions humaines*. Paris: La Découverte.
- Bancel, Nicolas, Pascal Blanchard and Françoise Vergès. 2006. *La République coloniale*, 2ème édition. Paris: Hachette.
- Bernard, Philippe. 2008. "Les fondations d'une cité," *Projet* 304: 4-11.
- Blanc-Chaléard, Marie-Claude. 2006. "Une Cité nationale pour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Genèse, enjeux, obstacles,"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92: 131-140.
- Césaire, Aimé. 2004. *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 suivi du Discours sur la négritud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 CNHI(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2006.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ouvre ses portes à Paris au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en avril 2007".
- . 2009. *Guide de l'exposition permanente*. Paris: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Cohen, Anouk. 2007. "Quelles histoires pour un musée de l'immigration à Paris !," *Ethnologie française* 37(2007/3): 401-408.

De l'Estoile, Benoît. 2007. *Le goût des autres : De l'exposition coloniale aux Arts premiers*. Paris: Flammarion.

Dupaigne, Bernard. 2006. *Le Scandale des arts premiers: La véritable histoire du musée du quai Branly*. Paris: Mille et une nuit.

El Yazami, Driss and Rémy Schwartz. 2001. *Rapport pour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national de l'histoire et des cultures de l'immigration*. Remis au Premier ministre le 22 novembre 2001. Mission de réflexion sur la création d'un lieu culturel dédié à l'histoire et au rôle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Friedman, Jonathan. 1994.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Girardet, Raoul. 2005(1972). *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62*. 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s.

Green, Nancy L. 2007. "History at Large. A French Ellis Island? Museums, Memory and History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3: 239-253.

Green, Nancy and Marie Poinsoot eds. 2008.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et question coloniale en Franc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odeir, Catherine and Michel Pierre. 1991. *L'Exposition coloniale*. Bruxelles: Éditions Complexe.

Latour, Bruno ed. 2007. *Le Dialogue des Cultures. Actes des rencontres inaugurales du Musée du Quai Branly*(21 juin 2006). Paris: Musée du Quai Branly.

La Mairie du 12e arrondissement ed. 2006. "L'Exposition coloniale, lieu de mémoire du XXe siècle," in *75 ans après, regard sur l'Exposition coloniale de 1931*, pp. 28-34. Paris: Mairie du 12e arrondissement.

MAAO(Le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ed. 2002. *Le Palais des Colonies. Histoire du Musée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Sous les directions de Germain Viatte and Dominique François. Paris: 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 Murphy, Maureen. 2007a.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au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Homme et migration* 1267: 44-55.
- . 2007b. *Un palais pour une cité. Du Musée des colonies à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 Noiriel, Gérard. 1988. *Le creuset français.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XIXe-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 Nora, Pierre ed. 1984.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 英文版: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以及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日文選譯版: 《記憶の場— 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社会史》 [ 岩波書店, 2002 ] )
- Nora, Pierre. 1997. “Préface à l’édition « Quarto » »,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La République, La Nation, Les France*. Tome 1, edited by Pierre Nora, pp.7-8. Paris: Gallimard « Quarto ».
- Rogan, Bjarne. 2003. “Towards a Post-colonial and a Post-national Museu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French Museum Landscape,” *Ethnologia Europaea* 33(1): 37-50.
- Segalen, Martine. 2005. *Vie d’un musée 1937-2005*. Paris: Stock.
- Stevens, Mary. 2008. “Immigrants into Citizens: Ideology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Museological Review* 13: 57-73.
- Stora, Benjamin. 2007. *La Guerre des mémoires. La France face à son passé colonial*. Paris: Éditions de l’Aube.
- Toubon, Jacques et als.. 2004.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Mission de préfiguration pour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de ressources et de mémoire de l’immigration*. Collection des rapports officiels.

三、網路資料

CNHI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2007. *Dossier de presse : Ouverture de la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http://www.histoire-immigration.fr/la-cite/presse/communication-institutionnelle> ° (2013/08/13瀏覽)